

悲劇故事的形成——李煜之死與相關傳說

時 間：113 年 10 月 17 日（四）10:00-12:00

地 點：國立東華大學人社三館元瑾講堂

主 講 人：方震華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）

主 持 人：潘宗億（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）

與 談 人：陳元朋（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）

記 錄：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

一、後主之死：各種紀錄的分歧及「牽機藥」之說的形成

南唐後主李煜（937-978）工書畫、通音律、善屬文，尤以詞作成就最高，近代學者王國維（1877-1927）稱「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」，後人譽為「詞中之帝」，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然而李煜身為南唐君主，卻有著「不恤政事」、「頗廢政事」的負面評價。現代人對其最為熟知的印象之一，當是國破被擄至汴京，最終宋太宗以「牽機藥」毒殺之，這也是國文課本內常見的說法。主講人方震華教授指出，從長期歷史發展來看，亡國之君李後主之死稱不上是重要課題，但卻受到後人的持續關注，留下了豐富的紀錄，值得玩味。關於「牽機藥毒殺」的說法，最早見於南北宋之際王銍（?-1144）《默記》一書，內容大抵為南唐舊臣徐鉉（916-991）奉宋太宗之命前往探視李煜，李煜對之悔歎昔日錯殺潘佑、李平兩臣，此事聞於太宗，故派秦王（趙廷美，947-984，太祖與太宗胞弟）賜予牽機藥；文中又記錄李煜於七夕時在受賜的宅第「命故妓作樂」（即：令舊朝的樂妓演奏音樂），聲聞於外，太宗聞之大怒；又傳聞李煜詞作中有「小樓昨夜又東風」及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等懷念舊土的文句，因而致禍。王銍也於紀錄中透露李煜遭受監禁及生活條件不佳，亦說明「牽機藥」毒發的情景。

事實上，《默記》所載南唐舊臣徐鉉即是李煜墓誌銘的撰寫者，其記載「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，遘疾薨于京師里之第」，據徐鉉的說法，李煜是因疾而亡，此乃為李煜死亡原因的最早紀錄。此外，北宋龍衮《江南野史》載：「太平興國三年秋，後主因疾作。上宣翰林醫視服藥，遣中使慰諭者數四，翼日而殂。」北宋馬令所撰《南唐書》卷五也有相同的紀錄。又北宋路振《九國志》、南

宋李燾（1115-1184）編撰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、南宋陸游（1125-1210）《南唐書》及元代官修之《宋史》等書，則未載明後主的死因。方教授指出，王銍「牽機藥」的說法較為晚出，藉由現代電子文獻資料庫搜尋，可以發現「牽機藥」一詞不見於其他傳世的宋代文獻，也不見於宋以前的文獻，甚至連「牽機」二字連用的例子都找不到。其他宋代文獻，也僅有北宋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二十二似乎暗示李煜死於非命：「李王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出生，錢王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，皆與賜器幣，中使燕罷，暴死，並見國史。」文中所云「錢王俶」即吳越國末代君主錢俶（929-988，原名錢弘俶，因犯太祖、太宗之父趙弘殷名諱，入宋後只稱錢俶），文中指稱李煜、錢俶兩位降王，皆於生日時接受使者宴飲後暴卒，據此影射非自然死亡。方教授分析認為，王銍的紀錄呈現了細節上的模糊，如其指李煜七夕作樂之事，據七夕相關民俗活動多於夜間，故即便因此事惹怒太宗，恐怕也不是當晚立即處置，與邵博七夕宴後暴卒的說法有出入；王氏紀錄僅言秦王送藥，並無李煜與使者飲宴的情節，亦有異於邵博之說；反之，邵博的紀錄則無「牽機藥」的說法。



圖一：主講人方震華教授

邵博與王銍皆生活於南北宋之交，當時顯然有數種關於李煜之死的說法流傳，故二人各據所知所聞，留下了內容互異的紀錄。但何以較晚出的說法，反而取代了墓誌銘等當時之紀錄？後世讀者又如何能在分歧的說法中進行選擇，以致於形成現代人所熟悉的印象，則是此研究的意義所在。方教授又舉明代陳霆（約 1477-1550）《唐餘紀傳》卷十八徐鉉傳所載：「是歲七夕，值後主生辰，因命

故妓作樂侑飲，聲徹第外。太宗聞之怒，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，加怒焉，遂命秦王移具過飲，竟有牽機藥之賜。」顯然是結合王銍與邵博的說法。故知明代士人將「秦王賜藥」與「七夕飲宴」兩種說法加以整合，形成新的李煜死亡敘事。

二、抽絲剝繭：李煜亡故之日分析及其降宋生活

方教授指出，王銍描述宋太宗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，是因李煜於七夕命故妓作樂，若此說成立，則李煜的死亡應在七夕之後。據徐鉉所撰墓誌銘，李煜死於「七月八日」，《長編》則記：「壬辰，贈太師、吳王李煜卒，上為輟朝三日。」依同書所載，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之朔日為「乙酉日」，則七月壬辰為八日，可見李燾所載日期與徐鉉相同，也與《宋史·太宗本紀》一致。但據《遼史》所記，該年此月朔日為「甲申日」，則七月壬辰為七月九日，未知孰是，這也導致李煜死亡之日的說法更加複雜。但邵博稱李煜死於七月七日，應是承襲《九國志》說法：「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，年四十二，是日，七夕也。」而陸游《南唐書》又承襲邵博之說，其云：「七月辛卯殂，年四十二。是日七夕也，後主蓋以是日生。」但李煜的生日與卒日是否即為七夕？方教授考察其他傳世文獻，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建隆三年三月乙亥條：「遣使如江南，賜唐主生辰國信物。」李煜於建隆二年（961）六月時即位，故此唐主即李煜。李煜在收到生辰賜物後，隨即遣使回謝，《長編》同年七月庚申條：「唐主遣客省使翟如璧來貢，謝生辰之賜也。」七月庚申是七月五日，若李煜生日果在七夕，則生日未過，回謝使者已到汴京，顯不合理。開寶四年（971）宋軍滅南漢後，李煜為顯示臣服，主動去國號，改稱江南國主。《長編》卷十四開寶六年（973）四月辛丑條：「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。」可知李煜之生辰應在四月或五月，不太可能在七月。

邵博的紀錄亦述及同為降王的錢俶卒於八月二十四日生日時，並稱此事見於「國史」，方教授認為邵博此說應是本於《太宗皇帝實錄》的記載：「（雍熙）四年春，上以俶抱病，俾遂頤養，授武勝軍節度使，改封南陽國王。俶拜章固辭國王之號，因改封許王。端拱元年春，徙封鄧王，會上遣使以生辰器幣就賜之。俶方與使者宴飲罷，殆暮，有大流星墮于正寢前，光燭一庭。是夕暴薨，年六十。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，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卒，人皆異之。」邵博可能誤將錢俶離開汴京的雍熙四年（987）當成是卒年，更忽略錢俶在離京前已然抱病，以及流星墮落錢俶正寢庭前的情節。《實錄》所記是將流星墜地與錢俶生日時「是夕暴薨」相連結，用以呼應天道與人事相應。再據北宋范杓、林

禹撰《吳越備史》、北宋慎知禮（928-998）撰〈錢忠懿王墓誌〉等資料，對於錢俶晚年生活都有詳細記載，可知太宗令他出掌武勝軍節度使（治所在鄧州，於今河南省轄內）乃因其健康不佳，故使其遠離京城複雜的權力鬥爭與人事紛擾，享有較多的自由度，但錢俶的健康未因此改善，太宗亦多次從京城遣醫為其診治。端拱元年（988），太宗因錢俶生辰將屆，派使臣至鄧州賜贈禮物，錢俶與使者飲宴後，發生流星墜地，錢俶隨即於翌日清晨辭世。

方教授認為，後人因錢俶與太宗所遣使者飲宴後死亡，懷疑其遭太宗毒死，但太宗若真要剷除錢俶，何需一再派醫官為其治病，等到病情好轉，再派使者將其毒殺？再綜合上述文獻所示，太宗對錢俶頗為禮遇、照護有加，顯與邵博紀錄中濃厚的陰謀論相違。那麼，對於李煜的情況又是如何？事實上，宋太祖開寶八年（975）十一月攻克南唐，李煜被俘至汴京後，受封為具貶低意味的「違命侯」，另有左千牛衛上將軍的官銜，使其有官俸收入。隔年太祖逝世，其弟趙光義繼位為宋太宗，改封李煜為「隴西郡公」，除實質地位提升外也去掉貶意。方教授再據《長編》、《宋會要》等書所載事例，指出太平興國二年（977）二月時，李煜曾向太宗訴說自己的貧窮，獲賜錢三百萬，據《宋史·職官志十一》所載，諸衛上將軍的月俸為六十千，故此次賜錢為其月俸的五十倍。太宗隨後再次下令，李煜與南漢末代君主劉鋹（942-980）「常俸外增以它給」。方教授談到，李煜曾以官員的身分參與太宗接待契丹使者的宮廷宴會、伴隨太宗田獵、與大臣至崇文院觀書等活動，顯與一般文臣一致。同時，深受宋太宗倚重的南唐舊臣張洎（934-997）曾向李煜索討財物，另一舊臣鄭文寶（953-1013）也曾打扮成漁人與李煜會面交談，顯示其未受人身限制。至於李煜的開銷甚大，可能與他仍保有部分宮女有關。綜此，太宗對於降宋諸君並無苛刻殘暴，反而是從優撫恤。



圖二：（左圖左起）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、主講人方震華教授、與談人陳元朋教授、主持人潘宗億教授；（右圖）講座一隅

三、文人相惜：決定歷史認知的因素

關於李煜之死，眾說紛紜，但自明代以降，王銍、邵博的說法被多數士人採信，進而衍生出對於宋太宗的批判，所形成的影響至今猶存。如明末徐樹丕（1596-1683）《識小錄》卷二〈宋太宗之不仁〉條，認為李煜與錢俶二人生辰與忌日相同，乃太宗「蓋銜忌未消，各借生辰賜酒食斃之，其不仁如此」，給予極為負面的評價；清初名臣王士禛（1634-1711）則於《古夫于亭雜錄》卷五〈刑章之失〉條，比較李煜與劉銀的命運，認為「宋太宗忌李後主，賜牽機藥，必置諸死，而赦窮兇極惡之劉銀。古今刑章之失，未有如是之甚者」，為李煜發出不平之鳴；清人袁枚（1716-1797）的文言志怪小說《子不語》卷九〈裹足作俑之報〉條，則根據纏足始於李煜的傳說，從因果報應的角度稱：「上帝惡後主作俑，故令其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藥之毒，足欲前，頭欲後，比女子纏足更苦，苦盡方薨」，死後又受「數十萬無足婦人奔走天門喊冤」，故上帝又於陰間施加懲處，此條雖未對太宗加以批判，但仍將牽機藥與之連結。事實上，清人對於李煜被毒死之說並非全無懷疑，但也很難全然不提，如畢沅（1730-1797）《續資治通鑑》云：「李後主之卒，他書多言賜鴆，非善終。……然《長編》及《宋史·世家》、柯氏《新編》皆不書，蓋闕疑慎言之意也，今亦不取。」畢沅並不採信宋代筆記的記載，效法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等書只記死亡之日而不載死因的作法，但仍言及「他書多言賜鴆」，卻未採用徐鉉等人的病卒說法。

方教授認為，面對諸多文本，讀者傾向採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說法。將此觀點投射於李煜的生平及作品，正因李煜降宋後的詞作充滿哀思，容易使讀者產生其遭受北宋皇帝虧待的印象，而王銍的說法正符合此種印象；李煜死於非命更讓其悲劇形象達於頂峰，即便不乏太宗厚待的紀錄，但很容易被當成是虛假的政治宣傳；再從載體的角度來看，王銍、邵博的紀錄採用「筆記」體，相較於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、官修《宋史》等史書，更為簡短易讀而富有故事性，也使其容易傳播。而徐鉉為李煜所寫的墓誌銘雖僅有一千餘字，但以充滿典故僻字的駢文撰寫，不利於傳播。對宋代以降的士人而言，李煜所代表的江南地域文化，對士人學術與生活諸層面有深遠影響，也讓李煜得到諸多同情；中毒而死的說法原本為李煜個人的悲劇，後來被擴大描述為宋初降王的共同命運，致使宋朝文人力圖塑造的本朝「仁君形象」產生動搖，也影響了歷來學者乃至現代人對於宋初政權的看法。